

汉魏两晋南北朝儒家经典与童蒙教育

金滢坤 常苈心

摘要 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的源泉和最主要的内容，魏晋南北朝儿童儒家经典的启蒙教育与察举制的变迁紧密相关。本文从察举时代汉代经学的整理、《五经》博士设置、魏晋玄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分裂政局变化等角度探讨该时期经学发展与童蒙教育的关系。笔者认为汉代大致确立了儿童教育以《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为主的格局，南北朝童蒙教育加强了对《五经》的教育，并受玄学一定程度的影响。南朝士族强盛、儒学兴盛，士族之家的儿童修习《五经》的情况较为常见，北朝相较而言，处于劣势，儿童修习《五经》的数量偏少，年龄偏大，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儿童修习《五经》的情况与南北朝《五经》博士设置、家学水平、私人讲学，以及察举制度的选才标准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 汉魏两晋南北朝 儒家经典 《孝经》 《五经》 童蒙教育

作者金滢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048）；常苈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48）。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2-0181-14

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的源泉和最主要的内容。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理论和实践基础。儒家经典在不同时代，以《六经》《五经》《九经》《四书》《十二经》《十三经》等名目出现，以便帝王、士人和民众诵读、学习和研究。因时代学风、政局的变化，儒家经典不断被注疏、整理、传记和解释，以适应国家统治和人才选拔的需要。中国古代童蒙的儒家经典教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等社会变迁对童蒙教育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察举时代汉代经学的整理、《五经》博士设置、魏晋玄学的兴起与童蒙经学教育关系。汉代以来童蒙经典教育大致以《孝经》《论语》为基础，经历从汉唐《孝经》《论语》和《五经》为主，到宋元明清《四书》《五经》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历史。

一、汉代经学发展与童蒙教育

汉代童蒙教育逐渐形成了重视《论语》《孝经》的传统。汉代蒙书《急就章》云：“宦学讽诗孝经论”。^①明确把《诗经》《孝经》《论语》作为童蒙教育的最基本的内容。历代童蒙教育重视《孝经》《论语》的原因，是由《论语》《孝经》的内容和国家需要培养的人才决定。^②《孝经》作为“群经之首”，“以纪天经地义”，^③《论语》“以纪先圣微言”。^④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① 史游纂，钮树玉校定：《校定皇象本急就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

② 参见王子今：《两汉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③ 《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3页。

④ 《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第1963页。

经》”^①。唐代赵匡说：“《论语》论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②。这应该是由“蒙以养正”即童蒙教育的根本性质来决定的，童蒙教育重在“义方”，“以明尊卑之义，正长幼之序”，^③因此，宣传“百行孝为先”，以“孝为本”的《孝经》，对培养和端正儿童的品性和行为举止无疑尤为重要。《论语》的地位要高于《孝经》，虽然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法，^④被视作治国利器，但《孝经》宣扬的忠孝观念，更加符合最高统治者的统治需求。

（一）《孝经》《论语》在童蒙经典教育中核心地位的确立

汉代讲《五经》，与《论语》《孝经》合称为“七经”。由于《孝经》《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最核心、最基础的内容，汉代最高统治者皇室和宗亲教育，都以此为内容。周一良先生认为汉代已经采用这两本书为童蒙读本。^⑤汉代太子教育很重视《论语》《孝经》的教育。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立昭帝为太子，时年八岁，始元五年（前82）六月，诏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⑥。其年昭帝十三岁，诵读童蒙书目中，《孝经》《论语》赫然在目。又汉宣帝时，疏受为太子少傅，教授十二岁的皇太子，“通《论语》《孝经》”^⑦。汉顺帝幼年在宫中就“小学”，读《孝经》。^⑧建武中，郎中包咸“入授皇太子《论语》”^⑨，其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⑩。显然，汉代太子教育的最重要内容为《孝经》《论语》。

汉代诸侯封王的太子也要学习《孝经》《论语》。如缪王齐太子刘去，“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⑪汉代宗室和外戚子弟教育也很重视经学教育。如元初六年（118），“邓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⑫其“经书”应该包括了《孝经》《论语》等必读经书。

两汉童蒙教育重视《孝经》《论语》的情况在乡村子弟教育中也有体现。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十一月，“研水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⑬相关实例很多，如汉末有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⑭东汉初王充，“八岁出于书馆”^⑮，因学习出众，“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⑯。东汉末有马续“七岁能通《论语》”^⑰。东汉桓帝建和三年（149）荀淑卒，其子荀爽“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⑱。不仅如此，东汉女童也有读《论语》的情况。汉顺帝梁皇后“九岁能诵《论语》”。^⑲

《论语》《孝经》也是汉代地方官办小学的主要教学内容。汉平帝元始三年（3）春，“立官稷及学

① 黄奭辑：《孝经纬·钩命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② 杜佑撰：《通典》卷17《选举典五》，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1页。

③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9元宗《加应道尊号大赦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9页。

④ 其典故出自（宋）罗大经撰：《鹤林玉露》乙编卷1：“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8页。

⑤ 周一良：《三国志札记·诵〈孝经〉》，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43页。

⑥ 《汉书》卷7《昭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3页。

⑦ 《汉书》卷71《疏广传附侄受传》，第3039页。

⑧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3《敬宗孝顺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1页。

⑨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包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70页。

⑩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包咸传》，第2570页。

⑪ 《汉书》卷53《广川惠王刘越传》，第2428页。

⑫ 《后汉书》卷10《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第428页。

⑬ 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1页。

⑭ 《后汉书》卷36《范升传》，第1226页。

⑮ 王充：《论衡》卷30《自纪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8页。

⑯ 王充：《论衡》卷30《自纪篇》，第308页。

⑰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从子严传》，第862页。

⑱ 《后汉书》卷62《荀淑传附子爽传》，第2050页。

⑲ 《后汉书》卷10《皇后纪下·顺烈梁皇后》，第438页。

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①元始五年，平帝又诏征“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②显然，汉代以教授《论语》《孝经》为业者不在少数，为儿童学习《论语》《孝经》提供了社会基础。此外，汉代推崇《孝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推行孝廉制度。延熹九年（165），荀爽对策云：“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③

（二）《五经》的整理与儿童经学教育

两汉经学极盛，影响到了汉代儿童的《五经》教育。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孔子所定《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至汉代已经亡《乐》，称“五经”。汉文帝始设经学博士，以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汉武帝设五经博士。^④

“五经”作为中国古代圣王、贤哲治理国家的经典和法宝，备受重视。正如归崇敬所云：“‘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国家创业，制取贤之法，立明经，发微言于众学，释回增美，选贤与能。”^⑤“五经”中最受童子欢迎的应该是《春秋左传》，其“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⑥，有“文之有左、马”之美称^⑦，“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⑧。《周易》，司马迁将其列为诸经之首，^⑨“可以正性命，观化元，贯众妙”。^⑩《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⑪显然，《诗经》对净化童子纯洁心灵，培养其“温柔敦厚”的品性自然是最好的经典。^⑫因此，有“训在《诗》《书》，乐惟名教”之说^⑬，《诗经》是童子训蒙教育的重要内容，很受世人重视。孔子还说“不学诗，无以言”^⑭。《礼记》对规范童子行为举止的启蒙教育具有最重要意义。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⑮。《尚书》被视为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治世经典，也是贵族、官宦子弟，以及士大夫必修的“明王道”之学，对童子来言，是最难读懂的儒家经典。

汉代正处在《五经》的整理和形成阶段，相关的教育处在发展阶段，儿童的《五经》教育尚不受重视。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太学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射策设科，劝以官禄，传业者故益众矣”。^⑯《五经》才正式成为汉代太学教授的内容。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⑰。“四姓小侯”学设《五经》博士，明确记载了东汉给外戚中的少年儿童讲授《五经》的情况。不过，按照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按“五经”分别设立博士，分经书讲授，鲜有太学生通读《五经》者，儿童学习“五经”的情况就更为难得。

按照汉代学制，成童进入太学之后，主要学习“五经”。由于汉代选拔一些“神童”破格入太学，为少数聪慧儿童学习“五经”提供了机会。如东汉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⑱以好经学著称，自然

①《汉书》卷12《平帝本纪》，第355页。

②《汉书》卷12《平帝本纪》，第359页。

③《后汉书》卷62《荀淑传附子爽传》，第2051页。

④参考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页。

⑤《旧唐书》卷149《归崇敬传》，第4017页。

⑥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卷95《艺文部一》，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364页。

⑦刘熙载撰，袁中琥校注：《艺概注稿》卷1《文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1页。

⑧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卷1《六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9页。

⑩吕温撰：《吕衡州集》卷3《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20页。

⑪《论语注疏》卷2《为政》，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61页。

⑫《礼记正义》卷50《经解》，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09页。

⑬李商隐撰，余恕诚著：《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3册《为裴懿无私祭薛郎中哀文》会昌四年八月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98页。

⑭《论语注疏》卷2《为政》，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22页。

⑮《论语注疏》卷2《为政》，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22页。

⑯《南史》卷71《儒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29页。

⑰《后汉书》卷45《张酺传》，第1528页。

⑱《后汉书》卷57《杜根传》，第1839页。

会修习“五经”。又任昭“年十四始学，疑不再问，三年中诵《五经》，皆究其义”，“号之为‘神童’”。^①两汉只有像杜安、任昭等少数神童，才学涉五经。在地方，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②汉元帝好儒学，“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③在郡国设立学官百石卒史，教授《五经》。地方郡国学校和《五经》学官的设置，无疑为地方儿童接受《五经》教育提供了方便。

在汉代官学大力推动《五经》教育的背景下，出现了儿童学习《五经》的相关记载。通一经的儿童有：东汉冯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④张霸七岁，通《春秋》。^⑤张堪六岁，“受业长安，治《梁丘易》”^⑥，号曰“圣童”^⑦。《梁丘易》是西汉梁丘贺所做，由《易经》发展而来，在汉代有梁丘易学派，可视为儿童学习《易经》的代表。东汉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⑧。考虑到《论语》《孝经》为儿童常见经书，不是《五经》，所以汉代童子读“五经”的情况，多为在《孝经》《论语》基础上，兼习《五经》之一经，就已经很突出了。

汉代私人讲学一般专授一经，受此影响，儿童学习经学多与此有关，因师就学。如汉代著名经学家承宫八岁，因受到乡里讲授《春秋》的名师徐子盛赏识，“遂请留门下”，才有机会学习《春秋》。^⑨东汉王充“八岁出于书馆”，因学习出众，“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⑩东汉末有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成童之后又诵《诗经》。^⑪又东汉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⑫，包咸在成童前后入太学学习《论语》，正好说明是童蒙教育的延续。由于“汉人最重师法”^⑬，“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⑭，无疑增加了儿童的学习《五经》的难度。

二、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发展与童蒙经典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最为动荡的时期，经历“五胡乱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政治黑暗，士族政治盛行，经学经历了中衰、分立期，^⑮其中伴随着“南学”和“北学”之分，玄学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儿童的儒家经典教育。

（一）《孝经》《论语》在童蒙教育中地位进一步巩固

汉末魏晋之际，曹魏和司马晋的开创者都是以人臣身份窃取帝位，不符合儒家正统论。西晋司马氏试图提倡名教，修复民心，却不敢言“忠”，只能提倡“孝”了。^⑯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盛行，东晋“王与马共天下”^⑰，在南朝皇帝由士族共同拥戴，士族轮流做，“忠君”的公德薄弱，“孝父”的私德盛行。与此同时，士族为了维护门第不衰，累世公卿，多建立家法、培养家风，维护家庭内部伦理道德的

① 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773《幼敏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95页；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58下刘昭《幼童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08页。

② 《汉书》卷89《循吏传·文翁传》，第3626页。

③ 《汉书》卷88《儒林传序》，第3596页。

④ 《后汉书》卷28上《冯衍传》，第962页。

⑤ 《后汉书》卷36《张霸传》，第1241页。

⑥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14《张堪》，第586页。

⑦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14《张堪》，第586页。

⑧ 《后汉书》卷62《荀淑传附子爽传》，第2050页。

⑨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卷2《承宫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⑩ 王充：《论衡》卷30《自纪篇》，第308页。

⑪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从子严传》，第862页。

⑫ 《后汉书》卷79《儒林传·包咸传》，第2570页。

⑬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77页。

⑭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7页。

⑮ 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70页。

⑯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收入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248页。

⑰ 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7—258页。

“孝”，就成了治理士族内部事务的现实需求，宣扬“孝道”的《孝经》受社会崇重，就很自然了。

魏晋以来，逐渐形成的太子、皇帝赴太学，释奠先圣孔子的制度，通常太子要举行讲经仪式，一般都以《孝经》《论语》为主。正始二年（241）二月，魏齐王“讲《论语》通”；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皇太子讲《孝经》通；晋惠帝元康三年（293），皇太子讲《论语》通；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皇太子讲《论语》通；东晋穆帝升平元年（357）三月，帝讲《孝经》通；东晋宁康三年（375）九月，孝武帝讲《孝经》。^①南朝太子讲经制度也大致如此。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②国子博士何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③太子幸太学，若不亲自讲，也会组织与《论语》《孝经》有关的学术活动。如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春，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④

北魏在魏晋皇帝、太子赴太学，释奠、讲经的制度基础上，开创了在皇宫开筵讲《孝经》的制度。北魏正始三年（506），宣武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⑤孝武帝也在显阳殿讲《孝经》。^⑥当然，北魏皇帝幸国学释奠，讲经制度仍在实行，通常首讲就是国子祭酒讲《孝经》。据《魏书·肃宗本纪》载：正光二年（521）春二月，北魏孝明帝“车驾幸国子学，讲《孝经》”。^⑦但《魏书·儒林传序》记载：正光二年，孝明帝“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⑧关于孝明帝和祭酒崔光谁讲《孝经》的问题，《魏书》在本纪和儒林传记载有所差别，以现有的资料可以解释为孝明帝主持开讲《孝经》仪式，深度讲解应该是祭酒崔光完成。这次讲经活动影响很大，有尚书驾部郎中羊深、尚书仆射崔亮、吏部尚书甄琛等“独蒙引听，时论美之”。^⑨又北魏孝武帝，“永熙中，复释奠于国学；又于显阳殿诏祭酒刘钦讲《孝经》”。^⑩又北周太祖亲临释奠，太学生杨尚希时年十八，“令讲《孝经》，词旨可观”，擢为国子博士。^⑪北朝皇帝开筵讲《孝经》制度和国学释奠讲《孝经》，无疑刺激士人对《孝经》的教育重视，会波及到童蒙教育。

不仅如此，北朝国子学、太学教育也承担了子弟的《孝经》《论语》教育。据《北齐书·儒林传序》载：“《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铉、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粗习习也。”^⑫可见北朝国子学生、太学生在入学之前，普遍对《论语》《孝经》不精熟，故需要再继续补修。北朝名儒多有注《孝经》《论语》，其实也反映了明儒对其重视。北齐明儒李铉，曾受业大儒徐遵明，“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合三十余卷”，年二十七，归养二亲，“因教授乡里，生徒恒至数百。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⑬其中也不乏年少童子。

南北朝还有太子东宫讲《孝经》制度，主要是皇帝为太子择师友。如北齐武平中，“皇太子将讲《孝经》，有司请择师友”，后主命名儒马元熙“以《孝经》入授皇太子”。^⑭显然，《孝经》《论语》也是为南北朝教授东宫太子的主要内容。陈文帝天嘉元年（560），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沈文阿，“于东宫

①《晋书》卷9《帝纪·孝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页。

②《南史》卷33《何承天传》，第869页。

③《南史》卷33《何承天传》，第869页。

④《陈书》卷34《文学传·徐伯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69页。

⑤《魏书》卷8《世宗宣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3页。

⑥《北史》卷42《刘芳传附子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50页。

⑦《魏书》卷9《肃宗本纪》，第231—232页。

⑧《魏书》卷84《儒林传序》，第1842页。

⑨《北史》卷39《羊祉传附子深传》，第1433页。

⑩《魏书》卷84《儒林传序》，第1842页。

⑪《隋书》卷46《杨尚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52页。

⑫《北齐书》卷44《儒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84页。

⑬《北齐书》卷44《儒林传·李铉传》，第584—585页。

⑭《北齐书》卷44《儒林传·马敬德传附子元熙传》，第591页。

讲《孝经》《论语》”。^①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尚书右仆射、国子祭酒周弘正，“敕侍东宫讲《论语》《孝经》”。^②南朝诸王的童蒙教育也以《孝经》《论语》为主。如梁鄱阳忠烈王萧恢，“幼聪颖，年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③

北魏明元帝跋嗣永兴元年（409）即位，便令崔浩“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④，以鼓励鲜卑人学习儒家经典。从崔浩解经名单来看，《孝经》《论语》紧跟在蒙书《急就章》之后，说明注解《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是为鲜卑贵族学习汉文化最紧迫的经典，其次为“五经”。

魏晋南北朝《孝经》《论语》教育的普及，同样与国子学设置《孝经》《论语》博士关系密切。东晋元帝即位，一度想设《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后因王敦之乱而罢。^⑤南朝刘宋国子学也设《论语》《孝经》博士各一人。梁朝大通四年（530）三月庚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帝所释《孝经》义”。^⑥

《孝经》《论语》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童蒙教育最基本的儒家经典。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云：钟会“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⑦魏晋南朝像钟会这样，儿童学习《孝经》《论语》超低龄化现象较为常见。晋恭帝四岁时，刘超“犹启授《孝经》《论语》”。^⑧南梁昭明太子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⑨又梁简文帝之子萧大圜，“年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⑩梁元帝时，颜之仪“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⑪萧齐徐之才，“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⑫又岑之敬，“父善紆，梁世以经学闻”，五岁读《孝经》，“每烧香正坐，亲戚咸加叹异”。^⑬显然，南朝帝王士族子弟学习《孝经》低龄化的现象明显增多。

南朝士族六七岁童子学习《孝经》《论语》的情况更常见。如宋大明三年（459），伏挺“七岁通《孝经》《论语》”。^⑭又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⑮齐朝伏挺“幼敏悟，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博学有才思，为五言诗”，“齐末，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⑯萧齐刘歊“六岁诵《论语》《毛诗》，意所不解，便能问难”。^⑰又梁武帝普通六年（526），马枢，“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⑱张讥，父祖世为梁朝清官，“年十四，通《孝经》《论语》”。^⑲

史书记载南朝儿童聪慧，将幼儿读《孝经》或《论语》的情况进行比较，《孝经》比《论语》更为常

①《陈书》卷33《儒林传·沈文阿传》，第436页。

②《陈书》卷24《周弘正传》，第309页。按：时年太子20岁。

③《梁书》卷22《萧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50页。

④《魏书》卷35《崔浩传》，第825页。

⑤《晋书》卷75《荀崧传》，第1976—1978页。

⑥《南史》卷7《梁本纪中》，第209页。

⑦《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85页。裴松之注引其母传说。按照钟会四岁是在魏明帝太和二年（228）。

⑧《晋书》卷70《刘超传》，第1876页。

⑨《梁书》卷8《昭明太子传》，第165页。

⑩《周书》卷42《萧大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56页。

⑪《周书》卷40《颜之仪传》，第719页。

⑫《北齐书》卷33《徐之才传》，第444页。

⑬《陈书》卷34《岑之敬传》，第461页。

⑭《梁书》卷50《伏挺传》，第719页。

⑮《梁书》卷48《严植之传》，第671页。其少时在宋明帝前后。

⑯《南史》卷71《儒林传·伏曼容传附嘏子挺传》，第1733页。

⑰《梁书》卷51《刘歊传》，第747页。

⑱《陈书》卷19《马枢传》，第264页。

⑲《陈书》卷33《张讥传》，第443页。

见,年龄更小。如刘宋王僧孺“年五岁,读《孝经》”^①，“六岁能属文”；庾黔娄少好学，“多讲诵《孝经》”，^②可见读《孝经》的童子年龄只有五六岁。又元嘉末，王绚“年七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③刘宋初，谢庄“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④。萧梁大通中（527—528），宗室萧修“九岁通《论语》，十一能属文”^⑤。相对而言，童子读《论语》在七至九岁。

北朝相对而言，士人幼读《孝经》《论语》者较南朝少见，而且年龄偏大，盖与北朝总体尚武轻文、士人幼好习武有关。^⑥如北魏文明太后之兄冯熙，“魏母携熙逃避至氏羌中抚育”，年十二“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好阴阳兵法”。^⑦又北魏太安狄那人王紘，为小部酋帅，少好弓马，年十三，“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⑧大概是王紘读《孝经》年纪较大，故深得其要。北魏李谧年十三，“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尽其长，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⑨

北朝宗室权贵子弟，习《孝经》《论语》年龄相对较早。如北魏林虑哀王元文，“五岁诵《论》《孝》”^⑩，为所见北朝儿童读《孝经》《论语》的最小年龄。如北周宋献公宇文震，“幼而敏达，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⑪其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父宇文泰是西魏权臣，意欲篡权，故比较重视子弟教育。又北周宗室宇文贵“少聪敏，涉猎经史，尤便骑”，在十岁之前，“始读《孝经》，便谓人曰：‘读此一经，足为立身之本。’”^⑫另据《周书·斛斯征传》记载：斛斯征“幼聪颖，五岁诵《孝经》《周易》，识者异之”。^⑬为北朝幼读《孝经》《论语》可以考订的年纪最小者，盖因其父斛斯椿诛尔朱荣，护驾孝武帝元修授入关有功，授侍中、仪同开府，算是关陇军功贵族受到宗室和权贵重视教育影响所致。

投靠北朝的汉族士大夫子弟，也相对比较重视读《孝经》《论语》。如韦师为北周骠骑大将军北韦瑱之子，“少沈谨，有至性。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⑭以“名教之极”之语，可见韦师也是受教学影响的结果。又北魏天水太守常文通之子常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⑮亦为家学所致。

北朝受尚武风气影响，不少士人到弱冠前后才习文，读《孝经》《论语》等童蒙阶段的经典，童蒙教育阶段往往滞后。如北魏武川镇人雷绍，“九岁而孤，有膂力，善骑射”。十八岁，“给事镇府，尝使洛阳，见京都礼义之美”，“遂逃归，辞母求师，经年，通《孝经》《论语》”。^⑯又南朝陈王僧辩投降北周，其子颊自幼入关，“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其兄颢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昼夜不倦”。^⑰虽然这均为个案，但很典型，可以大致反映北朝教授儿童《孝经》《论语》的意

①《梁书》卷33《王僧孺传》，第469页。

②《梁书》卷47《庾黔娄传》，第650页。少时在齐朝。

③《宋书》卷85《王景文传附子绚传》，第2184页。

④《宋书》卷85《谢庄传》，第2167页。

⑤《南史》卷52《梁宗室下·鄱阳忠烈王恢传附孙修传》，第1298页。

⑥参见张金龙：《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及其与柔然的和战关系》，《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9—200页。

⑦《魏书》卷83上《冯熙传》，第1818页。

⑧《北齐书》卷25《王紘传》，第365页。王紘十三岁，为宣武帝景明元年（500）。

⑨《魏书》卷90《李谧传》，第1938页。按：李谧，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十三岁。

⑩《魏故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林虑哀王志铭》，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6页。

⑪《周书》卷13《宇文震传》，第201页。其十岁时，盖在西魏初。

⑫《周书》卷12《齐炀王宪传附子贵传》，第196页。宇文贵，天和四年（569），十岁。

⑬《周书》卷26《斛斯征传》，第432页。

⑭《北史》卷64《韦瑱传附子师传》，第2276页。

⑮《魏书》卷82《常景传》，第1800页。

⑯《北史》卷49《雷绍传》，第1807页。

⑰《北史》卷84《孝行传·王颢传附弟颊传》，第2835—2836页。

识淡薄,且年龄偏晚的重要原因。

(二)《五经》博士制度对童蒙经学教育的推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中《五经》教育制度对儿童学习《五经》有很大影响。曹魏文帝就在洛阳设立太学,设置“《五经》课试之法”,选拔《五经》擢第者以叙用。^①西晋武帝再度重申“《五经》课试法”^②,晋元帝又在《五经》博士的基础上,增设了十经博士,其中《论语》《孝经》合为一经^③,有利地促进了官学对《论语》《孝经》的教育的发展。

北魏承魏晋旧制,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④,于天兴二年(399)“初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⑤明元帝盛瑞(414—415)中改为中书学,^⑥北魏世祖太武帝始光三年(426)春,“别起太学于城东”,^⑦至此形成了中书学、太学并存局面。孝文帝太和十年(486)改为国子学,^⑧同时又开皇子之学,恢复了国子学原有功能,并将皇子的教育功能归到了皇子之学。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一变旧风,崇重儒学,无疑推动了北魏士庶学习《五经》的热情。北齐北周承北魏旧制,设置《五经》博士。

南朝宋设国子学,继承晋制,设置“十经”博士,宋、齐之间,虽“公卿罕通经术”^⑨,但仍有早慧童子,入国子学。如萧齐卞华“幼孤贫好学,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及长,遍习《五经》”。^⑩如萧齐徐之才,“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⑪,“年十三,召为太学生,粗通《礼》《易》”。梁武帝天监四年(505),“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⑫国子学等官学系统破格招收年幼聪慧儿童入学,为儿童学习《五经》提供了可能。^⑬梁朝儿童通《五经》多的现象得益于梁朝《五经》博士的设置。

南朝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⑭。梁朝效仿齐制,实行太子侍读,“递日为太子讲《五经》义”的制度^⑮。梁武帝太子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⑯,可作为太子读《五经》的成功典范。此制对士庶子弟学习《五经》的热忱有一定的影响。

西晋州郡不少地方长官积极设置州郡学,客观上促进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西晋豫章太守范宁曾在本“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达千人之多,其中有不少童子入学,教授的内容主要是《五经》。如周续之年十二,就跟范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名冠同门,称为颜子”。^⑰西晋还有羊祜、唐彬、张轨等都在当地办学,为儿童接触《五经》教育提供了更多机会。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面临一个汉化问题,在地方官学建设方面比较重视。后赵石勒下

①《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第84页。

②《晋书》卷24《职官志》,第736页。

③《宋书》卷39《百官志上》,第1228页。

④《魏书》卷884《儒林传序》,第1841页。

⑤《魏书》卷113《官氏志九》,第2972页。

⑥参见梁满仓:《北魏中书学》,《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62页。

⑦《魏书》卷84《儒林序》,第1842页。

⑧《资治通鉴》卷136齐武帝永明四年(686)十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273页。

⑨《南史》卷71《儒林传序》,第1730页。

⑩《南史》卷71《卞华传》,第1739页。

⑪《北齐书》卷33《徐謩传附徐之才传》,第444页。

⑫《南史》卷71《儒林传序》,第1730页。

⑬《北齐书》卷33《徐謩传附徐之才传》,第444页。

⑭《南史》卷43《齐高帝诸子·江夏王锋传》,第1088页。

⑮《梁书》卷47《庾黔娄传》,第651页。

⑯《梁书》卷8《昭明太子传》,第165页。

⑰《南史》卷75《周续之传》,第1865页。

令,“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①石虎后来下令郡国设置“五经”博士。后秦姚萔也下令地方设置官学。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466),下令“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②北魏“郡国立学,自此始也”。^③孝文帝时,南安王建议诸州郡学生的“练考”,选任四门博士通《五经》者充当,说明北魏郡立国学教授的内容也是《五经》。

南朝童子修习《五经》者,往往得益于家学,多出自世儒家庭。南北朝是个士族社会,童蒙教育阶段,童子学习《孝经》《论语》,多与其家学有很大关系。其中,母教典型代表就是曹魏时期的钟会“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④其父钟繇为汉魏之际的大书法家,在东汉官至黄门侍郎,曹魏位至太傅,其母张氏也处在宦宦家庭,“性矜严,明于教训”,“雅好书籍,涉历书,特好《易》《老子》”。^⑤钟会就是在其父熏陶之下,母亲张氏“勤见规诲”之下,在入太学之前已经诵读了《五经》,其诵《周易》和成侯《易记》就是受其母特好《易》《老子》的缘故,充分体现了家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又谢贞为东晋谢安九世孙,其父蒯为梁朝散骑常侍,七岁时,其母王氏授《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⑥值得一提的是谢贞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受到舅舅尚书王筠的教诲。据《梁书·王筠传》载:“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⑦可见谢贞略通《五经》,尤善《左氏传》,是因为其舅王筠精熟《五经》,爱《左氏春秋》的缘故。可见母教往往与外亲家学有很大关系,其母王氏博学应该从小与王筠一起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受父教影响的有:梁朝王规为琅琊王氏,其父骞为梁中书令,其童年在齐梁之际,生在“文雅儒素,各禀家风”的世家大族之中,八岁丧母,年十二,略通“《五经》大义”,^⑧其博学应该主要来自父教。又梁朝褚修,其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最。天监中,历官《五经》博士。修少传父业,兼通《孝经》《论语》,善尺牍,颇解文章”,^⑨其“修少传父业”,当指“周易”。又梁《五经》博士沈峻之子文阿,“少习父业,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通《三礼》《三传》,位《五经》博士”。^⑩沈文阿“少习父业”,自然是习《五经》了。沈文阿的祖舅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⑪。又梁朝刘祥其父祖,“笃志好学”,^⑫其父刘璠“少好读书,兼善文笔”,^⑬为梁朝树功将军、镇西府咨议参军,其伯父黄门郎“有名江左”,刘祥从小号称神通,“年十岁能属文,十二通《五经》”,^⑭显然,刘祥幼通《五经》得益于家学。又梁会稽人虞荔,祖权为梁永嘉太守,父检为平北始兴王咨议参军,“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⑮显然,虞荔对《五经》

①《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51页。

②《魏书》卷6《显祖纪》,第127页。

③《魏书》卷48《高允传》,第1078页。

④《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第785页。

⑤《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第785—786页。

⑥《陈书》卷32《谢贞传》,第426页。

⑦《梁书》卷33《王筠传》,第486页。

⑧《梁书》卷41《王规传》,第581页。

⑨《梁书》卷47《褚修传》,第657页。

⑩《南史》卷71《沈峻传附子文阿传》,第1741页。

⑪《梁书》卷48《儒林传·太史叔明传》,第679页。

⑫《周书》卷42《刘璠传》,第760页。

⑬《北史》卷70《刘璠传》,第2435页。

⑭《周书》卷42《刘璠传》,第761—765页。

⑮《陈书》卷19《虞荔传》,第256页。

的熟悉程度,离不开其家学深厚。又陈朝顾野王,其父烜“以儒术知名。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①。父教往往与兄教相结合。又梁朝庐江灊人何炯,其父搏,太中大夫,兄为著名经学家何胤。何炯年十五,“从兄胤受业,一期并通《五经》章句”。^②何炯能在十五岁时学《五经》,应该与其兄何胤经学广博有很大关系。

南朝童子通《五经》较多的情况,与南朝经学发达有很大关系,个人聚徒讲学兴盛。^③如明僧绍“经有儒术”,宋永光中,“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其子元琳、仲璋、山宾并传家业,山宾最为知明。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④,入梁之后,“时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应其选”^⑤。又吴郡钱唐人范述曾,“幼好学,从余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学徒常有百数,独称述曾曰:‘此子必为王者师。’齐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时,高帝引述曾为之师友。”^⑥显然,余杭吕道惠讲《五经》常有数百人,其中还包括了南朝齐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年幼时都曾受其业。范述曾“幼好学,从余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⑦。又齐臧盾,“幼从征士琅琊诸葛璩,受《五经》,通章句。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⑧。又会稽余姚人虞荔,“年九岁,随从伯闾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⑨,竟然能应对自如,属于奇才。当然,十五岁成童前后,修《五经》者也不少。齐梁之际,原萧齐国子祭酒何胤“筑室若邪山”讲学,^⑩即在会稽云门山讲学,声名很大,就连梁朝国子监也“选遣学生”前往受业。^⑪会稽士庶儿童在此期间,就拜师其下。如孔奭就“少师事何胤,通《五经》”,^⑫学成之后自己又讲《三礼》《孝经》《论语》,“生徒亦数百人”。^⑬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也影响到儿童喜好玄学,童子在习《孝经》《论语》和《五经》之外,还会修习《老子》《庄子》和《周易》等道家经典。如钟会之母“特好《易》《老子》,每读《易》孔子说鸣鹤在阴、劳谦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户庭之义,每使会反覆读之”^⑭,因此,钟会十一诵《易》,十四诵《成侯易记》,盖受其母家教影响。梁刘歊六岁诵《论语》的同时,有诵《毛诗》,十一读《庄子·逍遥篇》。^⑮有的甚至先习道家经典,然后修《孝经》《论语》。如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礼记》”^⑯。又前引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马枢,“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等等。

北魏立国之初,就逐步地实行了汉化政策。如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永兴元年(409)即位,令崔浩“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⑰显然,《孝经》《论语》与《急就章》一样作为鲜卑贵族学习汉文化的童蒙教材,《五经》也赫然在列。然而,北魏经历

①《陈书》卷30《顾野王传》,第399页。

②《梁书》卷47《何炯传》,第655页。

③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收入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66—376页。

④《南史》卷50《明僧绍传》,第1243页。

⑤《南史》卷50《明僧绍传》,第1243页。

⑥《梁书》卷53《范述曾传》,第769页。

⑦《梁书》卷53《范述曾传》,第769页。

⑧《梁书》卷42《臧盾传》,第599页。

⑨《陈书》卷19《虞荔传》,第256页。

⑩《梁书》卷49《文学传上·钟嵘传》,第694页。

⑪《梁书》卷48《儒林传序》,第662页。

⑫《梁书》卷48《儒林传·孔奭传》,第677页。

⑬《梁书》卷48《儒林传·孔奭传》,第677页。

⑭《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第786页。

⑮《梁书》卷51《刘歊传》,第747页。

⑯《南史》卷71《儒林传·沈峻传附太史叔明传》,第1741页。

⑰《魏书》卷35《崔浩传》,第825页。

孝文帝改革之后，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但北朝儿童读《孝经》《论语》及《五经》的热忱还是不敌南朝。

北朝国子学、中书学、太学等中央官学主要开设儒家经学教育，其中就包含了《孝经》《论语》《五经》，在推动经学教育的过程中，也为聪慧童子提供了方便。官学破格招收，年幼的儿童，自然会接触到正规的《五经》教育。其中以中书学破格招收儿童入学，为其提供了超前学习《五经》的机会。据《魏书·祖莹传》云：

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儿”……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生徒悉集，莹夜读书劳倦，不觉天晓。催讲既切，遂误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曲礼》卷上座。博士严毅，不敢还取，乃置《礼》于前，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讲罢，孝怡异之，向博士说，举学尽惊。后高祖闻之，召入，令诵五经章句，并陈大义，帝嗟赏之。^①

值得注意的是，范阳祖莹十二岁破格进入中书学，在接受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的过程中，在没有带书的情况下，“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表现突出，竟然惊动了高祖孝文帝。祖莹在应召进见答孝文帝时，“诵五经章句，并陈大义”，表现超出寻常，可见中书学教授内容涵盖了《五经》。北魏中书学破格招收十五以下儿童的情况不少。据《魏书·李孝伯》载：赵郡李安世，幼而聪悟，兴安二年（453），“高宗引见侍郎、博士之子，简其秀俊者欲为中书学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见其尚小，引问之。安世陈说祖父，甚有次第，即以为学生。高宗每幸国学，恒独被引问。”^②可见北魏高宗文成帝是从侍郎、博士之子，简其秀俊者欲为中书学生，其中就包括了十一岁的李世安，因为其年龄偏小，才引起了魏文帝的注意，经过亲口问清楚李安世的情况之后，才准予入中书学，且后来每次幸国学，都爱专门提问李安世，说明李安世属于破格录取，故多受关注。考李安世之祖父曾，“少治《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授为业”，征拜博士，出为赵郡太守，其父孝伯“少传父业，博综群言”，历侍郎、西将军、秦州刺史，足见其家学之强大。李安世便是承其祖为博士、父为侍郎之荫，十一岁入中书学。又太和二年，韦纘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聪敏明辩，为博士李彪所称”^③，也就意味着可以接受到《五经》教育。北魏世祖太武帝，擢游明根入中书学，孝文帝以“明根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特被礼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随，而闾以才笔时侮明根，世号高、游焉”。孝文帝时，以其子肇，“幼为中书学生，博通经史及《苍》《雅》《林》说”，随后为内秘书侍御中散。^④可见游肇的识字教育与经史教育都在中书学完成。以上中书学破格录用的四人均聪明过人，且均为归附汉族士族子弟，但都算不上权要阶层，其父祖或为皇帝赏识，或因军功，由皇帝亲选，入中书学。中书学出身，可直接释褐秘书中散、侍御中散、秘书郎等基层清官，迁转快捷，多至公卿，试图光明，^⑤这对以文起家的汉人士族子弟很有吸引力。北朝童子破格入学太学者相对较少。如北周弘农杨尚希，“年十一，辞母请受业长安。涿郡卢辩见而异之，令人太学，专精不倦，同辈皆共推伏”，^⑥获得周太祖器重。

北朝汉族士家大族子弟幼学《五经》的家学优势明显。如北魏太和中，祖莹八岁，“能诵《诗》《书》”，其祖嶷为冯翊太守，父季真为位中书侍郎，算是归附的士族之家，也说明家学教育促进了祖莹早慧。北魏献文帝时，孙惠蔚“世以儒学相传。惠蔚年十三，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⑦后成为北魏大儒秘书监。北齐时有孙惠蔚的重族孙灵晖，幼时多到孙惠蔚家借书看，“年七岁，便好学，

①《魏书》卷82《祖莹传》，第1799页。

②《魏书》卷53《李孝伯传附从子安世传》，第1175页。

③《魏书》卷45《韦闾传附从子纘传》，第1014页。

④《魏书》卷55《游明根传附子肇传》，第1215页。

⑤ 参见梁满仓：《北魏中书学》，《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第262页；姚宏杰：《北魏中书学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⑥《隋书》卷46《杨尚希传》，第1252页。

⑦《魏书》卷84《孙惠蔚传》，第1852页。

日诵数千言，唯寻讨惠蔚手录章疏，不求师友，《三礼》及《三传》皆通宗旨”，^①可见孙灵晖仅凭借阅大儒孙惠蔚的经书评注，就自学成才，可见孙惠蔚对整个家族子弟都有很大影响。北魏宣武帝时，有六岁童子杨悛“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也是因为其父为弘农华阴杨父津在北魏累为司空侍中、其从父兄黄门侍郎昱，可谓是杨氏一门是北魏高门士族，“悛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足见其家学之强。^②又北魏相州刺史李安世之子谧，“十三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尽其长。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③据《周书·柳虬传》载：魏明元帝时，柳虬年十三，“便专精好学”，“遍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雅好属文”。^④考虑到柳虬年十三才好学，在其成童的两年内，略通《五经》的可能性较小，通其中部分经书还是可以的。而其有条件通《五经》是因为其祖缙为南朝宋安郡守，其父僧习，“善隶书，敏于当世，与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归魏，历北地颍川二郡守、扬州大中正”，属于南朝归魏的地方要员，把持地方评鉴人物的权力，教育自家子弟更是用心。北齐郎茂“少敏慧，七岁诵《骚》《雅》，日千余言。十五，师事国子博士河间权会，受《诗》《易》《三礼》及玄象刑名之学”。^⑤郎茂之所以在七岁的时候会诵《离骚》和《诗经》中的部分篇章，到十五岁成童之后，以门荫入国子学会，才正式受《五经》内容，这与父郎基为北齐颍川郡守，“泛涉坟籍”有很大关系，其祖道恩为阳平郡守，郎氏虽算不高门士族，虽然已属庶族地主，但其经学有限，仍不足以教授子弟《五经》。母教，北魏太和初，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年十二，请其母曰：‘岂可使兄傭赁以供景先也？请自求衣，然后就学。’”^⑥

北朝虽不乏私人讲学名儒，但不及南朝，童子出外求学者较为少见。仅见北魏太武帝时，河东闻喜裴安祖，年八九岁，“就师讲《诗》”，^⑦应该是从私人讲学者为师。

北朝与南朝相比，童子学习《五经》的情况乏善可陈。多数情况是童子修习《孝经》《论语》的基础上能诵《五经》中的一两部，就算是很优秀，罕有通《五经》者。北朝童子能学习《五经》者多为皇室、高门汉族士族子弟，这也是因为他们有更多机会获得良好的经学教育资源的缘故。北朝皇帝聘请名儒为诸王师，教授《论语》《孝经》及《五经》等内容。西魏文帝曾在大统十六年前，以给事黄门侍郎卢诞为诸王师。^⑧据《周书·宇文震传》载：在西魏大统中，宇文振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⑨盖宇文震与宇文毓（北周世宗）作为权臣宇文泰的儿子的缘故，陪西魏诸王师从卢诞。

北朝儿童学习《五经》与学《孝经》《论语》的情况相似，也是年龄偏大。如北魏皇室拓跋善因为“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通涉《五经》”^⑩。又北周王孝籍，“少好学，博览群言，遍习《五经》”^⑪。以上北朝士人“少”读《五经》的记载，若以古人十五岁成童来界定，大致判断其在成童前后读《五经》应该不误，正好可以反映北朝士人读《五经》偏晚的现象。又北魏李稚廉为齐州刺史义深之弟，“聪敏好学，年十五，颇寻览五经章句”^⑫。又东魏博陵平安人李德林，幼聪敏，“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⑬。尽管如此，史书记载士人少读《五经》中的若干经书情况还是很少。

①《北齐书》卷44《儒林传·孙灵晖传》，第596页。

②《北齐书》卷34《杨悛传》，第453页。

③《北史》卷33《李孝伯传附安世子谧传》，第1231页。

④《周书》卷38《柳虬传》，第680页。

⑤《北史》卷55《郎基传附子茂传》，第2014页。

⑥《魏书》卷43《房法寿传附族子景先传》，第978页。

⑦《魏书》卷45《裴骏传附从弟安祖传》，第1024页。

⑧《周书》卷45《儒林传·卢诞传》，第807页。

⑨《周书》卷13《宇文震传》，第201页。

⑩《北史》卷16《京兆王黎传附义孙善传》，第599页。

⑪《北史》卷82《王孝籍传》，第2768页。

⑫《北齐书》卷43《李稚廉传》，第571页。

⑬《隋书》卷42《李德林传》，第1193页。李德林十五岁，约为东魏武定三年（545）。

结语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文化政策，“焚书坑儒”，下“挟书令”，禁止私藏儒家经典，导致了儿童儒家经学教育的缺失。汉初高祖刘邦仍轻蔑儒学，至汉惠帝废除“挟书令”，儒学开始复苏。汉文帝时，依据老儒记忆默写的“今文经”，设置经学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儿童经学教育很有限。随着汉武帝在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教授经学，今文经学才得到广泛传播。汉武帝实行察举制，“明经”作为明经、明法、德行和政略“四科”取士标准之一，^①汉魏南北朝实行察举制，德行与明经都包含了经学的内容，从而影响了童蒙教育对《孝经》《论语》和《五经》的重视。

魏晋政权均为权臣相继窃取前朝的帝业，政治黑暗，无以言“忠”，只好言“孝”，在外和谐君臣之间的隔阂，居家适应世家大族治家需求。崇重《孝经》是世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察举制重孝廉和经术的反映。因此，士族之家有意从小教育子弟尽早修习《孝经》《论语》和《五经》等儒家经典，并凭借士家大族地位，利用各种方式相与评议，激扬名声，从而获得大小中正和权要的高评。

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渐形成的皇帝、太子赴太学、国子学，释奠先圣孔子的制度，多以讲《孝经》为主，次为《论语》，带动了童子学《孝经》《论语》的热情。魏晋南北朝官学中《五经》博士的设置和“《五经》课试法”的实行对儿童学习《五经》有很大促进作用。其中，晋元帝改置“十经”博士，将《论语》《孝经》合为一经，为儿童学习《论语》《孝经》提供了方便。北朝在北魏立国之初先后设置太学、国子学，设置《五经》博士制度，国子学一度改称中书学，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一变旧风，崇重儒学，无疑推动了北魏士庶子弟学习《五经》的热情，影响了整个北朝。南朝刘宋国子学置“十经”博士，宋齐之间，“公卿罕通经术”，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促进了经学热，^②也带动了梁朝儿童通《五经》的热情。南北朝太学、国子学破格招收聪慧儿童入学，也是儿童学习《五经》的重要途径，北魏中书学破格招收童子较为突出。

南北朝出身士族的儿童修习《五经》较多的原因，是由于士族之家多以世儒立身，南朝士族强盛与南朝儿童学习《五经》数量较大有直接关系。北朝儿童幼学《五经》主要集中在汉族士家大族子弟之中，说明汉族家学优势明显。南朝儿童通《五经》现象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梁朝以后私人讲学兴盛，如长广郡崂山有明僧绍、余杭有吕道惠、琅邪有诸葛璩、若邪山何胤等都是南朝名儒讲学，有教授童子。北朝私人讲学之风不及南朝，未见童子明确从私人讲学者习《五经》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也影响到了儿童喜好玄学，在童子在习《孝经》《论语》和《五经》之外，南朝儿童修习《老子》《庄子》和《周易》等道家经典的实例较多，而北朝儿童习庄老的情况比较少见。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典教育，以《孝经》《论语》为基本内容，《五经》为辅，南朝兼及《老子》《庄子》。南朝贵族政治盛行，士族子弟幼习《孝经》《论语》的热情高，呈低龄化趋势明显；北朝虽实行汉化政策，但汉族士庶之家地位有限，子弟读《论语》《孝经》年纪偏大。曹魏钟会学习《论语》《孝经》，通《五经》及《礼记》《国语》《成侯易记》等儒家、诸子和玄学内容，^③属于罕见现象，堪称魏晋南北朝儿童修习经书最多之人，唯有梁朝孔奂与其可比，不具代表性。周一良先生据此将钟会读书的顺序视为汉魏南北朝人读书之顺序，^④其顺序大致尚可，但很少有少年儿童做到。目前可以考定的南朝幼读《五经》的童子屈指可数，南朝有王筠、萧统、周续之、孔奂、谢贞、王规、褚修、沈文

①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22页。

② 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79页。

③ 《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第785页。裴松之注引其母传说。按照钟会四岁是在魏明帝太和二年（228）。

④ 周一良：《三国志札记·诵〈孝经〉》，《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41—43页。

阿、虞荔、臧盾、阮孝绪、刘祥、顾野王、何炯、明山宾、范述曾、太史叔明等。北朝与南朝相比，童子学习《五经》的情况，多为修习其中一两部，就算很优秀，罕有通《五经》者，明确记载儿童能通《五经》者唯有柳虬。北朝儿童学《孝经》《论语》和《五经》与的情况，较南朝明显偏大，偏少。

（本文为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2017 年度北京市长城学者培养计划（CIT&TCD201833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in Ha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JIN Yingkun, CHANG Jinxin

Abstract: Confucian classics were the source and the main content of Chinese ancient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the recommendatory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this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arrange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ve Classics Doctorate, the rise of Metaphysic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change of the spli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Han Dynasty basically established the pattern of children's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such as Filial Piety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hildren's education strengthened the education of the Five Classics and was influenced by metaphysic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gentries were strong and Confucianism was prosperous. It was common for children of Gentries families to study the Five Classics. Compared with the Northern Dynasty, they were in a disadvantag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studying the Five Classics was less and the age was older, which reflected the situation of children studying the Five Classic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ve Classics Doctorate, family learning level, private lectures and examination system.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factors.

Key words: Ha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onfucian classics,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Five Classics, children's education